

塔斯社报道《苏美会谈继续举行》

双方签署了苏美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十年协定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九日电】题：苏美会谈继续进行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进行会谈。

继续讨论了限制核武器试验问题。

还就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有关的问题（苏联和美国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交换了意见。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九日电】题：签署苏美协定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苏美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协定。

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十年。

苏联领导人和随同美国总统前来的美国国务活动家出席了签字仪式。

【美新处华盛顿六月二十九日电】题：美苏协定确定经济合作的性质

贝内特强调说，六月二十九日的经济协定不能代替美国的一项贸易法案，而是这样一个法案的重要补充。

他说：“协定具有长期的性质，但是仍未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我们仍然需要这样一种待遇。”

尽管尼克松政府一再提出要求，美国国会迄今为止一直拒绝通过一项规定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然而最近缔结的经济协定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因为这是作为一项行政协定而不是一项国际条约谈判达成的。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九日电】这里的一个财政部高级官员说，今天在莫斯科签订的美苏贸易协定将使美国企业家比较容易同苏联的政府机构谈判达成交易。

财政部副部长杰克·贝内特对记者说，虽然这个为期十年的协定没有打开新的局面，但是一年交换一次经济情报的协议将使美国出口商知道应在哪些方面集中努力。

贝内特说，协定的重要方面是，详细说明进行贸易谈判的领域以及交换经济情报的决定。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九日电】题：莫斯科

新闻中心的情况介绍会今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美会谈继续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

这是苏联发言人，塔斯社社长扎米亚京在莫斯科新闻中心举行的苏美最高级会晤情况介绍会上宣布的。

扎米亚京说，已经决定由双方专家继续研究限制核武器试验问题，并向参加会谈的两国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设想。

在莫斯科的会谈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签署了苏美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十年协定。

扎米亚京评述这一协定说，苏联很重视这个协定，它“决定了苏美合作的基本方向和实行合作的办法”。

美国发言人，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今天签署的这项协定“符合两国政府发展美苏经济关系的政策”，“这项协定反映了苏美对发展和平合作的愿望”。

齐格勒还说，这项协定证明双方致力于使苏美合作具有长期性。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十九日电】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前往克里米亚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往克里米亚继续进行求实的会谈。同他们一起离开的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西方石油公司同苏签订六个合同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六月二十八日电】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今天同苏联签订了六个合同，来执行两百亿美元的化肥交易。

美国人士说，这是政府和私人公司间签订的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交易。

哈默在外交部签字仪式上说，这是苏美贸易关系中的“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他说，十分有意义的是，签字仪式在第三次苏美最高级会谈时举行。他赞扬尼克松总统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因为这笔交易是在他们的帮助和关心下做成的。

美刊载文评述《艰难时期的开始》

说这三国的经济恶化有可能引起政治大动乱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六月二十四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艰难时期的开始》，摘要如下：

暂时看起来似乎不过是意大利的另一次政治危机。内阁成员按照惯例一边饮着一瓶瓶的矿泉水，吃着火腿夹乾酪的三明治，一边进行着激烈的讨论。鲁莫尔总理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三十五次更迭政府而变得司空见惯的礼仪，煞有介事地向奎里纳尔宫提出了他的辞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差错。同意大利的传统作法完全不一样的，上周没有一个政治家站出来取代鲁莫尔的地位。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意大利看来正在滑向接近破产的地步，要把它从边缘上拉回来，就需要采取严厉的不得人心的政治行动——如果挽救还确实仍有可能的话。

意大利危机的根源是石油价格的飞涨。而且害这种经济病的不仅限于意大利。整个西欧今年为了得到使它的家庭取暖和它的工厂能开工所需要的石油，将不得不付给阿拉伯国家二百亿美元的巨款——比去年增加一百五十亿美元左右。其结果是，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都将出现骇人听闻的国际收支赤字。这反过来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这三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增加到惊人的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微弱多数而执政的虚弱的欧洲国家政府，对于处理这些空前的经济问题所需要的严峻措施并未表现什么热情。何况

经过了几十年的美好生活之后，欧洲人显然是不想吞下节约这剂烈性药的。

“不可收拾”：鲁莫尔提出辞呈后的三天内，有势力的政界领袖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奎里纳尔宫同利昂纳总统讨论组成新政府的事宜。前景是不妙的。由于意大利的贸易逆差每月超过了十亿美元，这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了四十亿美元以下。过去两年内通过谈判借了一百零五亿美元贷款的政府，这个月要再借钱就感到更为困难了。况且，由于最近的政治危机和里拉即将贬值百分之二十的谣言，要获得新的财源是没有可能的。预算部长社会党人乔利蒂警告说：“局势已不可收拾。”他的大多数同胞有充分的理由同意这种悲观的估计。对普通意大利人来说，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光是食品和房租现在就耗去了他的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同样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意大利庞大的官僚机构本身就构成了促成通货膨胀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催化剂。它由于受到政治保护而膨胀起来，吞没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几近百分之四十。相比之下，税收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百分之三十一。这样一来，主要靠公众提供基金的许多机关便因最近发生的危机而受到了威胁。由于负债五十亿美元，上周有好些家靠公众支持的医院面临着关闭的威胁。

下降：英国也遇到同样情况，那里需要采取严峻的步骤，来使迅速接近百分之二十的通货膨胀率减慢下来。威尔逊首相的少数党政府上周宣布，英国五月份的贸易逆差为十一亿五千万美元——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英格兰银行马上警告说，英国的经济已处于“极大困难中”，伦敦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立即提出了加强货币限制措施的新要求。可是财政大臣希利却被他的工党同事们牵着往相反的方向走。于是伦敦的《经济学家》警告说，英国面临的情况要么是“和平时期历史上英国的生活水平的最大下降”，要么是“阿根廷那样的通货膨胀过分的局势……使得国家深深陷入就业不足的状态中”。

也许是因为政府稳定一些的缘故，新当选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采取了稍微坚定一些的经济立场。吉斯卡尔毫不犹豫地解除了一名不听话的内阁

部长的职务，继续在太平洋进行了大气层核试验，他宣布了一个适度的节约计划，其中包括增加税收。在这种新税收中，首当其冲的将是吉斯卡尔上台时投了他一票的商界和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全国雇主协会的一名负责人冷嘲热讽地说：“有许多投了吉斯卡尔一票的雇主将出乎意外地看到，他作为总统所做的头一桩事就是欺压他们。”

表示怀疑：这项新的节约计划也包括一些措施来降低法国的能源消费，减少公共开支和紧缩信贷。本刊的斯科特·沙利文报道，“就象他过去（都行不通）的反通货膨胀计划一样，吉斯卡尔最近的这个计划是一大批财政、经济和心理措施的大杂烩。”法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法国总统的这些措施并不足以达到吉斯卡尔想要使通货膨胀率放慢的目标，即从百分之十七点四下降到一九七五年七月的百分之六。他们也同样怀疑他的这种说法：这些措施将使法国的国际收支——预计一九七四年将出现八十亿美元的赤字——于明年恢复平衡。除非各主要欧洲国家能拿出成功的办法去医治它们经济上的毛病，否则共同市场和北约组织肯定将受到影响。

如果在处理这些巨大的经济脱节方面不赶快取得某种进展，将来就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大动乱。意大利的乔利蒂上周描绘了一个破产的国家可能象什么样子的阴暗图景：大量失业，食品短缺和经济瘫痪。

布托在达卡举行记者招待会

说认为这次访问能解决所有问题是空想

【美联社达卡六月二十九日电】（记者：爱德华·科迪）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今天说，同孟加拉国改善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一九七一年的内战留下了痛苦。

但是他提醒说，他到这里进行的三天访问只是第一步，许多复杂问题必须予以解决，然后有两年半历史的憎恨才能渐渐变为友好。

他在达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请记住这仅仅是我们的第一次会晤。这只是在两年半之后，在那次动乱之后我们第一次相见。”

布托一直在同孟加拉国总理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会谈，这是第一次国家对国家的谈判，目的在于使关系正常化得以开始。

布托表示，对于谢赫·穆吉布提出的在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之前须就重要争端达成某种具体协议的要求，已经作了很大让步。

孟加拉国外长侯赛因说，这些问题是：达卡要求分享巴基斯坦的国家财产，并把要求离开孟加拉国的约三十五万非孟加拉人遣送到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士说，而布托来孟加拉国是设法立即改善气氛，并为仅仅在将来友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作好准备。

布托说：“如果孟加拉国政府认为不能这么做，那么我们也不着急。”

他说，对于孟加拉国的这两项重要要求仍在进行讨论，但是他强烈表示，在这次访问中他们将不会达成最后解决办法。他说：“我愿意说，期望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那是空想。”

【合众国际社达卡六月二十九日电】（记者：西尔瓦纳·福阿）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天的双边会谈结束之后，巴基斯坦官员今天对孟加拉国官员表示十分愤怒。

他们说，取得任何具体成就的希望很快消失。

一位高级巴基斯坦军官悲叹说：“这些（孟加拉）人使我们感到十分愤怒。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一度是同情的。我认为，他们在被人利用，但我现在不再同情这些头号大傻瓜了。”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八日刊载詹姆斯·赖斯顿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杰克逊将去北京》，全文如下：

华盛顿州的杰克逊参议员这些天来正在变成最卖劲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变成亨利·基辛格的挑战者，而且变成五角大楼，军火工业，亲以色列集团，劳联—产联里的劳工领袖们宠爱的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基础——有点象他自己的军事—工业—劳工集团——因此在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前夕他攻击基辛格和政府的控制战略武器政策，然后自己动身访问北京，这并不是偶然的。杰克逊是很值得注视的一个人。他在这里已经呆了三十三年以上——十二年在众议院，二十一年在参议院——而且虽然他已六十二岁，但是有公牛一样的精力，而且看上去只有五十岁左右。他还对当代的大多数重大问题有强烈的看法。

他现在的主要论点是，“缓和”是一个圈套，俄国人正在利用这个晦涩的法文字来取得他们用威胁和恫吓所得不到的军事控制。他坚持说，他并不反对同莫斯科妥协，但是他要根据那些照基辛格看来是不可能得到的条件实现妥协。这就是分歧所在。

杰克逊参议员并不否认，水门事件削弱了尼克松政府，但是他认为，尽管有水门事件，苏联比美国要弱得多，认

为“缓和”会给我们带来的是模糊的政治上的好处，而苏联对西方贸易和先进技术的需求比我们对这些政治上的好处的需求更大。总之，他认为基辛格对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凭他通常有的机智指责基辛格太“软”，指责尼克松“急于”要作出军事和商业上的让步。

对外事务的极度混乱和严重困难并没有使杰克逊感到为难。他在辩论对外事务时是很能干的，他的忠实态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不允许在对外事务方面有真正令人困惑的情况，也不同意关于大国能够改变的主张。他认为在基辛格的慢条斯理的哲学态度中，只会出现巨大的灾难。

因此，虽然他最近在私下同国务卿谈论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议的问题，但是他公开建立障碍以阻止作出他担心会作出的虚假的妥协，因为这种妥协只会帮助总统克服水门障碍，但会使美国处于难堪的，甚至是危险的战略地位。

事实上，他对尼克松—基辛格使命的挑战是如此大胆，以致召集同他一样表示担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并指责政府同莫斯科进行将使美国处于军事

上的不利地位的“秘密”交易，这样甚至使一贯批评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参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也发言为总统辩护。

富布赖特说：“如果有人利用水门事件来破坏我们的对外政策，这不是俄国人，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和参议院的某些成员。……和缓的敌人带着分毫不差的时间观念，选择总统去莫斯科的时刻向他的政策发射了一些炮弹。”他接着指责杰克逊正是怀有这种意图。

这位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把这仅仅说成是胡说八道，然后就去北京了，中国人在总统的莫斯科之行的时候欢迎他去那里，从而使他在北京得到一个讲台继续开展他的宣传运动，这大概不是什么巧合。

公平地说，他对苏联的良好意图始终是不发表意见的。他相信力量而不是哲学的说服力，他依靠这一点，而不是依靠俄国人的公道，基辛格先生的口才或者尼克松总统的判断和智慧。

基辛格先生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复杂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互利的妥协树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世界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他将象他向埃及总统萨达特

所说的那样“为了和平而碰一下运气”，他相信如果不碰一下运气就会遇到更大的危险。但是杰克逊不是那样。他看到的只是神秘的莫斯科之谜，他相信导弹。

如果他拿他夺取总统职位的最后机会作一次赌博，把宝押在这种观点上，那么这大概是一次诚实而可悲的赌博，因为他是要恢复冷战，这不大可能成为一九七六年最得人心的纲领。

归根结蒂，总统最成功的实验，以及他在没有任何别的具体支持的情况下使他仍能站得住脚的一件事，恰恰就是他勇敢地努力摆脱冷战，以及——用他的话来说——从对抗的时代走向和解的时代。

尽管如此，杰克逊先生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有强大的力量支持他，如果总统为实现可靠的武器控制和中东的真正和平而进行的努力没有产生结果，公众舆论可能转而支持杰克逊。

但是，不论公众舆论是否转而支持他，他大概将继续为执政而奔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在当代主张新政和冷战的人——对内主张自由化，对外采取强硬不屈态度。他有一种充沛的精力，但是几乎总是用来唱对台戏。他似乎是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既劝不醒也无可救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中国人大概会同意他的意见——特别由于他对俄国人是如此猜疑。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八日电】

(记者：塞尔日·德·根茨伯格)正当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本周中苏关系发生两件重大事件。

二十六日，法国一家报纸刊登了苏联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寻常的文章。他的许多“独家新闻”使人们认为，他是被他的政府选择来放出试探性气球的。

路易斯的文 章包含着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如果三月十四日在中国领土上着陆的三名苏联直升机驾驶员因进行间谍活动而被审判的话（现在看来是可能的），将进行严重的报复。

二十五日，塔斯社报道，关于边界问题的高级谈判代表伊利切夫在离任一年之久后返回北京。尽管在北京的苏联人士竭力缩小这个行动的意义，但这件事清楚地表明苏联打算恢复对话。

在北京的苏联人士说，恢复边界谈判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肯定的。他们又说，伊利切夫没有受权讨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直升飞机事件和中国船只在哈巴罗夫斯克城附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航行权问题。

软硬兼施的苏联人期待着中国人在直升飞机问题上作出单方面的善意姿态——释放驾驶员或者放弃审讯。作为交换，则可能恢复边界谈判。

最近，苏联使人们认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同中国的立场相距不很远。他们现在似乎准备签署一项新协定而不坚持中国所说的十九世纪俄中“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

中苏之间争论的不仅仅是边界问题。两国在原则问题上，即俄国沙皇和中国皇帝之间签署的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上互相对立。新中国只想对边界作小规模的调整，但是却力求铲除“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软弱时期所强加予它的耻辱。

与此同时，路易斯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指责中国人把三名直升飞机驾驶员放在笼子里示众。

他又说，苏联人没有忘记一九六九年同中国人发生的边界事件。

这个不寻常的警告暗含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在以往的一切边界冲突中，俄国人一向总是胜利者。现在则不完全是这样了，因为苏联人终于被迫撤出了珍宝岛（达曼斯基）——一九六九年激战的地点。

路易斯的警告和伊利切夫的返回北京，两者并不矛盾。这两件事完全体现了苏联党魁勃列日涅夫六月十四日的选举演说中所阐述的立场。

他说：“苏联政府准备对任何进攻进行报复，一心要捍卫它在远东的利益。但是它坚决主张使它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主张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保持友谊。”俄国人表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因此，中苏危机看来已经达到一个临界点。

法新社记者评中苏关系
认为路易斯最近在法报发表的文章是苏修放出的试探气球

《中国：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找不到配对》

【本刊讯】美国《巴

尔的摩太阳报》六月二十七日刊登该报莫斯科分社记者迈克尔·帕克斯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找不到配对的国

家》，摘要如下：苏联正在把它同中国的激烈争吵作为一个重要的和使局势复杂化的因素塞进苏美最高级会议。

莫斯科过去一周来一直设法要人们注意它同中国交界的四千七百英里边界线上的紧张局势加剧，并展示在那里恢复敌对行动的前景。

向美国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看来是这样的：美国在中苏发生大冲突时同谁站在一起？

消息灵通的苏联人士

说，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成为苏美进一步改善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莫斯科准备告诉尼克松总统，在中苏严重的对峙出现时宣布中立既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现实的。不过莫斯科用的字眼可能比这要含蓄些。

如果这个问题如此直截了当地向尼克松先生提出来，这将使美国在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处于困境，因为总统既很强调同莫斯科改善关系，也很强调同北京改善关系。

这样一来，美国以前担心两个共产党巨人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其余各国的心理就颠倒过来，而这是有讽刺意味的，仅仅提出这一问题就会确凿地证实中国

人发出的苏美勾结对付小国的指责。

从眼前说，克里姆林宫提出这个问题大概是为了在谈判限制军备和禁止地下核试验问题期间得到美国的让步。双方都必须考虑到苏联的这个共产党邻国和敌手对苏联造成的威胁。

苏联对一位外交问题专家昨天说：“坦白地说，美国在核军备方面要担心的只有我们，而我们却既要担心美国，又要担心中国。”

“我们不能忘了中国，在这方面，如果要双方都对协议感到满意的

话，美国也不能忘了中国。”苏联军备控制问题专家最近指出中国的核武库不断扩大，并试制了它自己的中程和洲际导弹，认为这是莫斯科在同华盛顿

达成任何限制军备协议方面应该多拥有一些导弹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人士昨天说，这种双重担心在谈判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方面也是一个因素。

一位苏联外交问题专家说：“中国的试验使整个这一问题复杂化了。但是，这种复杂情况如果被了解的话，是可以克服的。”

中国对尼克松总统将在这里同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军备谈判的影响，也许最终可以从所达成的一些协议中以及苏美官员随后作出的解释中推测出来。

不过，此间苏联人士认为，不大可能公开地多谈华盛顿会在紧张的中苏争端中起的作用，但是这是勃列日涅夫打算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索尔仁尼琴谈尼克松访苏
说美苏两国国内都面临巨大危险

【美联社纽约六月二十四日电】流亡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谈前夕说，美国总统从来不会象他现在这样处于如此软弱的地位。索尔仁尼琴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克朗凯特发表谈话时说，他现在十分软弱，他没有力量对苏联发号施令，无论如何，原来的条约也没有得到执行。索尔仁尼琴说，关于西柏林的总协议被践踏了，关于武器——限制核武器——的条约也被违反了。他认为，同西方的缓和没有改善住在苏联的人的处境。他说，苏联的情况变得更糟了。索尔仁尼琴说，苏美两国国内都面临巨大的危险。他说，在你们国家和在我国，命运不轻松。我认为，就国内而言，美国和苏联都有巨大危险。——

苏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宣布绝食

要求尼克松同苏会谈政治犯和人权问题

【法新社莫斯科六月二十八日电】苏联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今天宣布，他将于今天午夜开始绝食，以说服尼克松总统和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考虑苏联政治犯的命运。

萨哈罗夫对一批外国记者说，他想抗议对被监禁者实行“非法和残暴的”镇压，要求改善他们的条件，要求重新审理并释放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

在场的十一名记者中有四名报道尼克松总统对这里的访问的美国特派记者。

萨哈罗夫特别向他们重述了他对缓和的想法，强调只有苏联社会实行自由化，特别是只有尊重人权，缓和才有可能

是牢固的。【美联社莫斯科六月二十八日电】萨哈罗夫在最高级会议前夕，给了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一封信，要求他们在自由移居和给政治犯以自由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萨哈罗夫说，他考虑通过绝食来支持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这封公开信“以及这封信里所包含的种种呼吁”。

英国《邂逅》杂志二月号刊载大卫·马基舒的文章

《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

【本刊讯】英国《邂逅》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号刊载苏联作家大卫·马基舒的一篇文章，题为《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摘要转载如下：

近年到过中苏边区多次，有时徒步、有时骑马，与巡逻军队一起。

在中亚地区，边界线就攀援上下于帕米尔诸峰和高高的天山高原上。

我想从它们的名字开始——帕米尔和天山。

俄罗斯人喜欢美丽的名字，他们称帕米尔为“世界屋脊”。在波斯文原意里，帕米尔是“死亡之脚”的意思。曾经

给这座大山命名的波斯人现在已不再宣称帕米尔是他们的地方了。但直至最近，他们还在为那小小的伊朗胜地菲尔尤扎强烈抗议。那个地方在第二次大战后没有经过流血就落到俄国人的手上，之后，俄国人就似乎干脆地记不起要离去了。菲尔尤扎在苏联南部土库曼地区首府阿什哈巴德附近，是那里唯一比较清凉的地方，土库曼所有党政显要现在都住在那里。如今，波斯人似乎已经获得失去菲尔尤扎的补偿，他们已停止激动了。

天山的情形就有点不同。在苏联吉尔吉斯边区，不但“天山”这个中国名字仍然存在，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俄罗斯人当然希望铲除这两样东西，但那是极端困难的。俄国人从来就是把地方名字重新命名的大师，他们当然可以用列宁或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来称呼天山，但这样做一来是不够巧妙，二来会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对。至于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影响，似乎并无方法可以把它根除。吉尔吉人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因素，长久以来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接触，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憎恨和鄙视中国人。他们也不相信那些稚拙、絮叨不休的反华宣传，就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一样，俄罗斯人“老大哥”式的宣传引起了反感，它只会增加吉尔吉斯人的亲华倾向。而俄罗斯人处理这种危险的政治不满的方法却是出奇地幼稚的，他们更改了伊塞克湖南岸Kitai（“中国”的意思）村的名字，并且把地区首府普尔热瓦尔斯克的中式食店关闭。

但吉尔吉人不会忘记他们住在中国北部的同胞，后者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反俄起义被压服后逃往中国的。对俄罗斯人来说，整个苏联——吉尔吉斯——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吉尔吉人与俄罗斯人对立的问题。俄罗斯人大概占去了吉尔吉斯人口一半，他们称本地人为“野蛮人”。吉尔吉斯的民族知识分子正在世界渐渐抬头，他们对这个称号和情况正越来越不能忍受。

不管怎样，还是回到中苏边区的话题吧。我曾经由伊塞克湖经过巴斯考峡到达中苏边界的其中一段。巴斯考峡里长满了罂粟和天山杉。峡底有一条河奔流着，河身狭窄而河水又深，船只不能航行。整个峡谷陡峭地向南斜起，在它的开口处的岸边就是一个边界哨站，哨站由一系列的建筑物组成，包括有营房、马厩、司令部、拘留所、储物室以及为哨站司令员和他的政治副手而设的两座房子，整个营地有围墙包围着。司令员和政治副手通常都有家眷同住。这是受到上级鼓励的，他们特别关心边防地区军官的性生活。不过一般士兵可不能得到上级这种关心，他们，正如当地人说的，在三年的服役期间必需忍受忍受。

巴斯考的哨站是一个典型的山中哨站，位于边界线的一百二十英里后面。这里的卫兵监守着峡谷的开口，检查出入证件。本地居民都要得到在护照上特别盖印，参观者事先要得到民兵的准许，而且期限是极短的。

在大约十年之前，所有这些都是简单、明确、而又可以理解的。那时并没有边界哨站的存在。当时没有俄罗斯人想在月黑风高之夜偷入中国国境。苏联的边防军还曾在盛大的仪式中把前线哨站移交吉尔吉斯牧人作为“文化中心”，然后退居后方。这个哨站被改建为一间商店，一所医疗中心和一间邮局。

我曾在这个文化中心渡过了两个月的时光，那是夏末秋初的时节。我与牧人一同狩猎野山羊，没有人干涉我们。既没有狩猎检查官，边防军又已经离开那里。有一次我这样问过牧人们：“中国的土地是从哪里开始的？”他们只是含糊地指给我看。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哪里是吉尔吉斯的尽头，以及哪里是中国的开始。

九月开始，第一场雪已降下了。地上的小径因水淹而不见了，那小小的邮政飞机也不再前来，我决定乘坐骑回伊塞克。我的牧人朋友借给我一只没有上鞍的牦牛。

在回程第一日的黄昏，我碰见一个单独的牧人的帐幕。那个牧人非常贫穷，而又像所有贫穷的山地人一样非常好客。他邀请我共进晚餐和住宿。刚饮过了

原编者按：大卫·马基舒是一位著名的年青苏联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妻子曾在伦敦替他发起一次运动（是英国报章上热烈讨论的“马基舒案”），最后苏联允许他出境。他现在同妻子一起住在以色列，刚刚完成一部自传，内容包括他在游牧的西伯利亚的经历。中苏边界地区是不开放的，除非持有由苏联宣传机构发出的特许证，马基舒是得到《观望》（讽刺性刊物）和《苏联》两本周刊的推荐而参观该区搜集资料的。

半杯酒，我们就谈起来了。

那个牧人与他的羊群、妻子和小姨一起过游牧生活。帐幕里满是三个小孩的叫声。那个牧人是可爱而又和蔼的人，他有着粗大的手臂和脖子。他正在带着羊群和所有的东西前往中国边界上的草原过冬。当我们谈到打猎和吸血的集体农场经理时，顿时投契起来。他又邀请我与他一起过冬，保证我每天都可以获得第一等的狩猎山羊和雪豹的机会。

“跟我们一起去吧，”他说：“你不会后悔的。这里的空气是奇妙的好。在六星期左右，我们便进入中国取火药和麦粉。”

“进入中国？”

“当然，”牧人回答说，并不明白我的惊讶：“进入中国。我们得在早上起程，下午就可以到达那里。而往返伊塞克则需要两天的时间。”

“那些边防军怎办？”我问：“我想他们认识你吧。”

牧人挥一挥手。“不要管他们！你几时在这里见过一个士兵？这里根本没有他们的东西，他们坐着没事做。”

“你以前到过中国吗？”我问。

“当然到过，很多次了。你带几只羊过去，便可带回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带你去乌鲁木齐或是喀什，留下我的女人看羊。”

“你怎能横过边界？”我继续问：“那些有刺铁丝网、探射灯和了望台怎办？……”

“那里根本没有这些，”牧人打断我的话，“只有山脉，更多的山脉。无论如何，中国人和吉尔吉人是亲戚。”

那牧人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只是政治观点比较差劲。

也许现在该谈谈那些守卫苏联边疆的人。

那些驻守在边境上——边界哨站上——的部队并不属于苏联陆军、并不听命于国防部长。边防部队由国家安全局指挥，它的总司令直接向国家安全局主席负责。那些被派往边防部队服役三年，通常是来自俄罗斯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未受教育而又无知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机会接触过苏联和西方作家写的“危险”书籍，对西方的生活知道得十分含糊，他们都相信资产阶级在吮吸劳动人民的血后正在梦想横过边界进攻苏联。边防部队的政治人员尽量减少吉尔吉斯本族人在吉尔吉斯—中国的边区上服役。吉尔吉斯边防士兵在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远东、在西部和在北部，总之是除了吉尔吉斯以外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让那些在边区长大的人防守边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他们不憎恨中国人，他们很可能同情住在边界对面的吉尔吉斯族兄弟。因此，最好是让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驻守吉尔吉斯。

在边防部队里服役比在苏联陆军里艰苦和费力得多，这也是很多边区军官要求调职的原因。军官要脱离边防部队须经过极端复杂的手续，不过那也比士兵们好，因为士兵简直就不能这样做。一个士兵在三年服役期间，甚至不可回家渡假（因为当局以为他可能会泄漏一些机密的资料，或者会与一些意图叛国者密谋）。在天山地区，“边界”与“边区”的概念是相当含糊的。俄罗斯人一定很后悔当初不划清边界的位置、不挖掘小径和不架起有刺铁丝网。现在很难补上这些东西了。不过，事实上，俄罗斯人也不知道正确的界线应该在哪里。至于中国人，他们很小心对待这个问题，他们谨慎的态度使俄罗斯人暴跳如雷。所以，俄罗斯人只得不停地谈论他们给中国人谷物、给中国人建造飞机厂和中国人的忘恩负义……（俄罗斯人永远不能总结经验，其实“忘恩负义”在阿尔巴尼亚事件、捷克八月事件和苏联军事顾问被逐出埃及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过）。

最近我从吉尔吉斯首府伏龙芝出发，到过最高的山区边区哨站之一图鲁卡特。它位于二个大约一万英尺高的雄伟而巨大的雪原上，离开假定是中苏边界的地方只有数英里。在安全地跨过纳伦山脉后，我们的Gaz—69式军车进入了阿特巴希镇。这里虽然离开边界至少六十英里之遥，但已经算是“边区”了，而生

活的法则更像是一部制作粗劣的间谍电影。

我的司机在岗哨外面停了车，因为有些文件要盖印，我便爬出车外前往对面马路一间餐厅。我当时穿了一身爬山服装，一条牛仔褲、皮外衣和太阳眼镜，颈上挂着两部照相机。这样的装束在那里当然是很奇特的。

我还未走近柜面，就被几个人逮住。他们把我的手依“正常方式”扭在背后，把我带领到岗哨的司令部，司机正在那里整理证件。

“我们抓到一个特务！”我的俘虏者对主管军官说。

一分钟之后，我问那些尴尬的居民，什么原因使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唔，”他们喃喃的说：“你的黑眼镜和照相机……”

我说一个真正的间谍不会带着照相机进入一间餐厅，这完全说服不了他们。

我们在傍晚时到达图鲁卡特。那里的司令员刚巧不在，他的副手——一名年轻的乌克兰上士检视了我的证件，把我带进一个禁闭室。室内贴着教育性的海报和地图。那名上士坐在栢的对面，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我。

司令员——他的名字是马拉特——在凌晨两三点钟左右回来。我立即由囚室被带到马拉特的屋子，那名上士服从地把我的背囊带到它的新居处。

我在与马拉特共尝一瓶伏特加酒时，向他解释我要跟随巡逻骑兵巡视边区。

“你可以这样做，”马拉特说：“但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让你的坐骑溜进中国。”

“如果溜进去会怎样？”我问。

“我们的士兵晚上出巡，”马拉特解释道：“中国人也每晚巡逻……”

“与中国人纠缠起来就是大大的麻烦，不值得这样做。”我听了不觉微笑起来。

我跟随的巡逻队由两个年青的俄罗斯人组成：一个中士和一个士兵。我们三人在翌日三点半起床，穿着沉重的棉衣、皮靴和羊皮外衣出发。这些装束的重量真是使人举步维艰，不过我们终于来到卫兵室等候命令。

“你们现在是出发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界，”马拉特以一种庄严的歌剧腔调宣布道：“在以下边界部分……”他把墙上一幅地形图上的幕拉开。差不多整幅地图都布满了“中国人争夺的土地”的字句。表示边界的虚线穿过我们这个区域，那就是我们说凌晨四点钟巡逻到十点钟的地方……

我们骑上马背，在那月色下闪烁的雪原上奔过，马儿很小心地跑着。

“你的任务是监视着天空。”那中士告诉我。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见一架飞机、或一枝火箭、或一个伞兵，你就发出像鹰那样的叫声。”中士解释道。

“我不懂得发出鹰那样的叫声。”我告诉他。

“那就发出其他的声音吧。”中士这样决定。显然他在那晚并不预料会看到飞机、火箭或伞兵。

“行军时不许抽烟或谈话。”他这样命令。

不管怎样，一个小时候，我们下马“周围视察”一下，然后大家都燃起了香烟。

“我们是在中国吗？”我向中士低声问，打破了山间死一般的沉寂。

“我不知道，”中士说：“可能是。”

“你是从哪里来的？”

“罗斯托夫地区（译按：在莫斯科北部附近）。”中士回答说：“再过八个月零十三天后我就回家了。”他郑重地说，简短而流利。

“你不喜欢中国人吗？”过了一会我又问道。

“我为什么会喜欢？”他立即反击说：“看我们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而他们……看看，他们有七亿人，可能更多。他们当中任何人连两个铜板都没有。他们会把我们当早餐吃掉。而他们多么蠢——他们吃蛇的，你相信吗？”

这里那名士兵插嘴说：“他们像蚂蚁一样——布满在每样东西上面。如果我们现在不粉碎他们，将来我们的子孙就会变成斜眼睛了……”

“但你怎样粉碎他们呢？”我问：“他们会反抗的。”

“他妈的问题就在这儿。”那士兵同意我的说法：“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和他们扑灭，要在他们有原子弹之前。现在可能太迟了。”

“行军时不得谈话！”中士说：“是离去的时候了。”我们又再排成单行横过雪原。地平线上射出一缕银色的阳光，把天空染上碧玉和黄金般的颜色。

（转载自香港《七十年代》杂志）

英国《邂逅》杂志二月号刊载大卫·马基舒的文章

《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

【本刊讯】英国《邂逅》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号刊载苏联作家大卫·马基舒的一篇文章，题为《沿着苏联边界——中国的土地从这里开始》，摘要转载如下：

近年到过中苏边区多次，有时徒步、有时骑马，与巡逻军队一起。

在中亚地区，边界线就攀援上下于帕米尔诸峰和高高的天山高原上。

我想从它们的名字开始——帕米尔和天山。

俄罗斯人喜欢美丽的名字，他们称帕米尔为“世界屋脊”。在波斯文原意里，帕米尔是“死亡之脚”的意思。曾经给这座大山命名的波斯人现在已不再宣称帕米尔是他们的地方了。但直至最近，他们还在为那小小的伊朗胜地菲尔尤扎强烈抗议。那个地方在第二次大战后没有经过流血就落到俄国人的手上，之后，俄国人就似乎干脆地记不起要离去了。菲尔尤扎在苏联南部土库曼地区首府阿什哈巴德附近，是那里唯一比较清凉的地方，土库曼所有党政显要现在都住在那里。如今，波斯人似乎已经获得失去菲尔尤扎的补偿，他们已停止激动了。

天山的情形就有点不同。在苏联吉尔吉斯边区，不但“天山”这个中国名字仍然存在，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俄罗斯人当然希望铲除这两样东西，但那是极端困难的。俄国人从来就是把地方名字重新命名的大师，他们当然可以用列宁或勃列日涅夫的名字来称呼天山，但这样做一来是不够巧妙，二来会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对。至于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影响，似乎并无方法可以把它根除。吉尔吉人因为地理和历史上的因素，长久以来都和中国有着紧密的接触，他们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憎恨和鄙视中国人。他们也不相信那些稚拙、絮叨不休的反华宣传，就像所有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一样，俄罗斯人“老大哥”式的宣传引起了反感，它只会增加吉尔吉斯人的亲华倾向。而俄罗斯人处理这种危险的政治不满的方法却是出奇地幼稚的，他们更改了伊塞克湖南岸Kitai（“中国”的意思）村的名字，并且把地区首府普尔热瓦尔斯克的中式食店关闭。

但吉尔吉人不会忘记他们住在中国北部的同胞，后者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反俄起义被压服后逃往中国的。对俄罗斯人来说，整个苏联——吉尔吉斯——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吉尔吉人与俄罗斯人对立的问题。俄罗斯人大概占去了吉尔吉斯人口一半，他们称本地人为“野蛮人”。吉尔吉斯的民族知识分子正在世界渐渐抬头，他们对这个称号和情况正越来越不能忍受。

不管怎样，还是回到中苏边区的话题吧。我曾经由伊塞克湖经过巴斯考峡到达中苏边界的其中一段。巴斯考峡里长满了罂粟和天山杉。峡底有一条河奔流着，河身狭窄而河水又深，船只不能航行。整个峡谷陡峭地向南斜起，在它的开口处的岸边就是一个边界哨站，哨站由一系列的建筑物组成，包括有营房、马厩、司令部、拘留所、储物室以及为哨站司令员和他的政治副手而设的两座房子，整个营地有围墙包围着。司令员和政治副手通常都有家眷同住。这是受到上级鼓励的，他们特别关心边防地区军官的性生活。不过一般士兵可不能得到上级这种关心，他们，正如当地人说，在三年的服役期间必需忍受忍受。

巴斯考的哨站是一个典型的山中哨站，位于边界线的一百二十英里后面。这里的卫兵监守着峡谷的开口，检查出入证件。本地居民都要得到在护照上特别盖印，参观者事先要得到民兵的准许，而且期限是极短的。

在大约十年之前，所有这些都是简单、明确、而又可以理解的。那时并没有边界哨站的存在。当时没有俄罗斯人想在月黑风高之夜偷入中国国境。苏联的边防军还曾在盛大的仪式中把前线哨站移交吉尔吉斯牧人作为“文化中心”，然后退居后方。这个哨站被改建为一间商店，一所医疗中心和一间邮局。

我曾在这个文化中心渡过了两个月的时光，那是夏末秋初的时节。我与牧人一同狩猎野山羊，没有人干涉我们。既没有狩猎检查官，边防军又已经离开那里。有一次我这样问过牧人们：“中国的土地是从哪里开始的？”他们只是含糊地指给我看。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哪里是吉尔吉斯的尽头，以及哪里是中国的开始。

九月开始，第一场雪已降下了。地上的小径因水淹而不见了，那小小的邮政飞机也不再前来，我决定乘坐骑回伊塞克。我的牧人朋友借给我一只没有上鞍的牦牛。

在回程第一日的黄昏，我碰见一个单独的牧人的帐幕。那个牧人非常贫穷，而又像所有贫穷的山地人一样非常好客。他邀请我共进晚餐和住宿。刚饮过了

原编者按：大卫·马基舒是一位著名的年青苏联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妻子曾在伦敦替他发起一次运动（是英国报章上热烈讨论的“马基舒案”），最后苏联允许他出境。他现在同妻子一起住在以色列，刚刚完成一部自传，内容包括他在游牧的西伯利亚的经历。中苏边界地区是不开放的，除非持有由苏联宣传机构发出的特许证，马基舒是得到《观望》（讽刺性刊物）和《苏联》两本周刊的推荐而参观该区搜集资料的。

半杯酒，我们就谈起来了。

那个牧人与他的羊群、妻子和小姨一起过游牧生活。帐幕里满是三个小孩的叫声。那个牧人是可爱而又和蔼的人，他有着粗大的手臂和脖子。他正在带着羊群和所有的东西前往中国边界上的草原过冬。当我们谈到打猎和吸血的集体农场经理时，顿时投契起来。他又邀请我与他一起过冬，保证我每天都可以获得第一等的狩猎山羊和雪豹的机会。

“跟我们一起去吧，”他说：“你不会后悔的。这里的空气是奇妙的好。在六星期左右，我们便进入中国取火药和麦粉。”

“进入中国？”

“当然，”牧人回答说，并不明白我的惊讶：“进入中国。我们得在早上起程，下午就可以到达那里。而往返伊塞克则需要两天的时间。”

“那些边防军怎办？”我问：“我想他们认识你吧。”

牧人挥一挥手。“不要管他们！你几时在这里见过一个士兵？这里根本没有他们的东西，他们坐着没事做。”

“你以前到过中国吗？”我问。

“当然到过，很多次了。你带几只羊过去，便可带回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带你去乌鲁木齐或是喀什，留下我的女人看羊。”

“你怎能横过边界？”我继续问：“那些有刺铁丝网、探射灯和了望台怎办？……”

“那里根本没有这些，”牧人打断我的话，“只有山脉，更多的山脉。无论如何，中国人和吉尔吉人是亲戚。”

那牧人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只是政治观点比较差劲。

也许现在该谈谈那些守卫苏联边疆的人。

那些驻守在边境上——边界哨站上——的部队并不属于苏联陆军、并不听命于国防部长。边防部队由国家安全局指挥，它的总司令直接向国家安全局主席负责。那些被派往边防部队服役三年，通常是来自俄罗斯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未受教育而又无知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机会接触过苏联和西方作家写的“危险”书籍，对西方的生活知道得十分含糊，他们都相信资产阶级在吸吮劳动人民的血后正在梦想横过边界进攻苏联。边防部队的政治人员尽量减少吉尔吉斯本族人在吉尔吉斯—中国的边区上服役。吉尔吉斯边防士兵在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在远东、在西部和在北部，总之是除了吉尔吉斯以外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让那些在边区长大的人防守边区；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他们不憎恨中国人，他们很可能同情住在边界对面的吉尔吉斯族兄弟。因此，最好是让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驻守吉尔吉斯。

在边防部队里服役比在苏联陆军里艰苦和费力得多，这也是很多边区军官要求调职的原因。军官要脱离边防部队须经过极端复杂的手续，不过那也比士兵们好，因为士兵简直就不能这样做。一个士兵在三年服役期间，甚至不可回家渡假（因为当局以为他可能会泄漏一些机密的资料，或者会与一些意图叛国者密谋）。在天山地区，“边界”与“边区”的概念是相当含糊的。俄罗斯人一定很后悔当初不划清边界的位置、不挖掘小径和不架起有刺铁丝网。现在很难补上这些东西了。不过，事实上，俄罗斯人也不知道正确的界线应该在哪里。至于中国人，他们很小心对待这个问题，他们谨慎的态度使俄罗斯人暴跳如雷。所以，俄罗斯人只得不停地谈论他们给中国人谷物、给中国人建造飞机厂和中国人的忘恩负义……（俄罗斯人永远不能总结经验，其实“忘恩负义”在阿尔巴尼亚事件、捷克八月事件和苏联军事顾问被逐出埃及后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过）。

最近我从吉尔吉斯首府伏龙芝出发，到过最高的山区边区哨站之一图鲁卡特。它位于二个大约一万英尺高的雄伟而巨大的雪原上，离开假定是中苏边界的地方只有数英里。在安全地跨过纳伦山脉后，我们的Gaz—69式军车进入了阿特巴希镇。这里虽然离开边界至少六十英里之遥，但已经算是“边区”了，而生

活的法则更像是一部制作粗劣的间谍电影。

我的司机在岗哨外面停了车，因为有些文件要盖印，我便爬出车外前往对面马路一间餐厅。我当时穿了一身爬山服装，一条牛仔褲、皮外衣和太阳眼镜，颈上挂着两部照相机。这样的装束在那里当然是很奇特的。

我还未走近柜面，就被几个人逮住。他们把我的手依“正常方式”扭在背后，把我带领到岗哨的司令部，司机正在那里整理证件。

“我们抓到一个特务！”我的俘虏者对主管军官说。

一分钟之后，我问那些尴尬的居民，什么原因使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唔，”他们喃喃的说：“你的黑眼镜和照相机……”

我说一个真正的间谍不会带着照相机进入一间餐厅，这完全说服不了他们。

我们在傍晚时到达图鲁卡特。那里的司令员刚巧不在，他的副手——一名年轻的乌克兰上士检视了我的证件，把我带进一个禁闭室。室内贴着教育性的海报和地图。那名上士坐在栢的对面，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我。

司令员——他的名字是马拉特——在凌晨两三点钟左右回来。我立即由囚室被带到马拉特的屋子，那名上士服从地把我的背囊带到它的新居处。

我在与马拉特共尝一瓶伏特加酒时，向他解释我要跟随巡逻骑兵巡视边区。

“你可以这样做，”马拉特说：“但你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让你的坐骑溜进中国。”

“如果溜进去会怎样？”我问。

“我们的士兵晚上出巡，”马拉特解释道：“中国人也每晚巡逻……”

“与中国人纠缠起来就是大大的麻烦，不值得这样做。”我听了不觉微笑起来。

我跟随的巡逻队由两个年青的俄罗斯人组成：一个中士和一个士兵。我们三人在翌日三点半起床，穿着沉重的棉衣、皮靴和羊皮外衣出发。这些装束的重量真是使人举步维艰，不过我们终于来到卫兵室等候命令。

“你们现在是出发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界，”马拉特以一种庄严的歌剧腔调宣布道：“在以下边界部分……”他把墙上一幅地形图上的幕拉开。差不多整幅地图都布满了“中国人争夺的土地”的字句。表示边界的虚线穿过我们这个区域，那就是我们说凌晨四点钟巡逻到十点钟的地方……

我们骑上马背，在那月色下闪烁的雪原上奔过，马儿很小心地跑着。

“你的任务是监视着天空。”那中士告诉我。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看见一架飞机、或一枝火箭、或一个伞兵，你就发出像鹰那样的叫声。”中士解释道。

“我不懂得发出鹰那样的叫声。”我告诉他。

“那就发出其他的声音吧。”中士这样决定。显然他在那晚并不预料会看到飞机、火箭或伞兵。

“行军时不许抽烟或谈话。”他这样命令。

不管怎样，一个小时后，我们下马“周围视察”一下，然后大家都燃起了香烟。

“我们是在中国吗？”我向中士低声问，打破了山间死一般的沉寂。

“我不知道，”中士说：“可能是。”

“你是从哪里来的？”

“罗斯托夫地区（译按：在莫斯科北部附近）。”中士回答说：“再过八个月零十三天后我就回家了。”他郑重地说，简短而流利。

“你不喜欢中国人吗？”过了一会我又问道。

“我为什么会喜欢？”他立即反击说：“看我们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而他们……看看，他们有七亿人，可能更多。他们当中任何人连两个铜板都没有。他们会把我们当早餐吃掉。而他们多么蠢——他们吃蛇的，你相信吗？”

这里那名士兵插嘴说：“他们像蚂蚁一样——布满在每样东西上面。如果我们现在不粉碎他们，将来我们的子孙就会变成斜眼睛了……”

“但你怎样粉碎他们呢？”我问：“他们会反抗的。”

“他妈的问题就在这儿。”那士兵同意我的说法：“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和他们扑灭，要在他们有原子弹之前。现在可能太迟了。”

“行军时不得谈话！”中士说：“是离去的时候了。”我们又再排成单行横过雪原。地平线上射出一缕银色的阳光，把天空染上碧玉和黄金般的颜色。

（转载自香港《七十年代》杂志）